

農經專家李登輝教授的志業與貢獻

蔡吉源

台灣心會秘書長

田君美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摘要

本文旨在略評李登輝教授的志業與貢獻，敘述其學術成就；探討其擔任總統期間的施政重點與得失；而李登輝總統卸任以來，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李登輝教授對台灣農業及經濟發展問題研究功夫深厚，對台灣農業及經濟發展問題研究功夫深厚，無人可及，受到國內外學術界極大的肯定。1972 年 5 月 20 日，被蔣經國內閣延攬為政務委員；1984 年擔任第 7 屆副總統；1988 年蔣經國總統逝世後，繼位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一職。擔任總統期間，以「經營大台灣」為主軸，堅持走艱難而正確之民主改革路線。提出戒急用忍政策，避免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為台灣前途苦心籌劃，用心經營。但李登輝總統未能起用新人，未能體察國際新情勢，在面對決策困境時猶豫不決，喪失行動契機，少有突破中華民國殖民剝削體制的大改革。總之，李登輝總統只是一個民主化改革者而不是革命家。

關鍵詞：李登輝情結、經營大台灣、戒急用忍、民主進步黨、台灣團結聯盟

壹、前言

李登輝教授在農業經濟研究方面最負盛名；由於他在農業與經濟發展的著作十分豐富，在長期重稅盤剝下台灣農村經濟逐漸凋敝之 1960 年代、1970 年代初期，李登輝教授的研究報告極受各界重視，引起中華民國流亡政府¹注意，而於 1972 年蔣經國內閣中出任政務委員，展開其一生志業及傳奇的三十多年政治生涯；從政務委員、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副總統到總統，歷任要職，勳績卓著。然而，在這一個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下，受到各方掣肘而難以突破既存框架，致譽之所至，謗亦隨之，令人感慨！

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期間（1988 年 1 月至 2000 年 5 月），幾乎所有本土台灣人都有李登輝情結。本土台灣人在期待他肩負起台灣現代化任務外，能消除蔣介石法西斯遺毒及劣質中國文化影響，甚至，希望他像摩西一樣，帶領大家脫離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殖民剝削體制統治，實現社會公義，進而建立一個正常發展的台灣國！

作者自 1970 年 8 月初起擔任李登輝教授的研究助理，後來，又在李老師指導下撰寫碩士論文；因此，作者的李登輝情結比任何人尤為濃厚。早些年，若有人無中生有惡意批評李登輝先生，只要能力所及一定挺身而出為李老師申辯！然而，檢視過去二十餘年來國際形勢與台灣在各方面的發展，又難免會去探討他在執政期間，究竟犯了什麼錯誤，以至於今日台灣政治亂象百出，社會日趨沉淪，經濟發展遲滯。

¹ 見林志昇控告美國政府案（標的：台灣國際地位與台灣人權保護訴求，案號：1:06-cv-01825-RMC）經華盛頓聯邦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灣人無國籍（2008.3.18）。美國聯邦高等法院（Court of Appeals）判決要點有四：60 年來本土台灣人無國籍；台灣人至今仍生活在政治煉獄中；台灣人無國際社會一致承認之政府；美國行政部門有義務協助原告解決其問題（2009.4.7）（Native Taiwanese have essentially been persons without a state for almost 60 years. The inhabitants of Taiwan are trapped in political purgatory. Over the past sixty years the people on Taiwan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d government.）。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案號：09-33）於 2009 年 10 月 5 日宣布：擱置待審〔deny，經查證何瑞元（Richard Hartzell）說 deny 表示依慣例年度之內只審 150 案〕，本案年內不予列入，並無駁回之意。

本文第二節略評李登輝教授的學術成就與一生志業；第三節扼要檢討其施政重點與得失；第四節在濃厚李登輝情結下，檢討為什麼過去台灣的發展令人失望；在本土台灣人政治及經濟雙雙失落的十年中，李登輝前總統又扮演了什麼角色？發生了什麼作用？最後一節是結語。

貳、李登輝教授的學術成就與人生志業

任何人只要翻閱李登輝先生（1983）《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及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I, II* 三大冊共 2,729 頁的鉅著，就會由衷佩服李教授對台灣農業及經濟發展問題研究功夫深厚，無人可及。三大鉅冊 103 篇論文完成於 1950 年至 1977 年間。基本研究成果，如〈台灣農業與其他經濟部門關係之分析——投入產出表之初步研究〉（1961），是與其長官謝森中先生及王友釗先生合著之成名作。做為部屬，依中國官場慣例，當然是最主要的執筆人了。若沒記錯，這一篇基礎研究曾出版單行本，在學界一時膾炙人口，洛陽紙貴！

但是，為李登輝教授贏得舉世推崇之個人巨著 *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Lee, 1968），則是在 1968 年發表於 Cornell University 的博士論文。這篇利用社會會計方法，研究台灣農工兩部門資金流通的大作，不但曾為李登輝教授贏得全美農經論文第一獎，而且在經濟發展學術界極受肯定，也在 Youtopolus 與 Nugent（1976）的教科書裡，大幅引用他的假設（hypothesis）及實證結果。

李登輝教授應用了歷史學的觀點，分析台灣農業發展過程，再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印證台灣農業發展策略的有效性。他大量使用台灣農業發展史的資料，詳盡加以整理與分析，研析出台灣農業發展的規律，歸納出農業發展的程序與步驟，他從實際情況出發，進行深入研究，指出合理資源的配置、結構調整與技術進步，可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證實台灣農業發展的正確性。

李登輝教授在完成博士學位後，寫了許多深入淺出的農業經濟政策評論及研究報告，諸如〈農工不平衡發展的癥結與其解決途徑——兼論農業結

構改善問題〉(1969)、〈台灣勞動生產力、工資與物價——兼論近年來經濟結構的轉變與物價上漲之關係〉(1970)、〈台灣農業與農村問題考察報告〉(1971)及〈「加速農村建設運動」之意義〉(1972)等。

「加速農村建設運動」之農業改革九大措施，是李教授出任中華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之前一年(1971)，在對農村問題有極為深刻的了解下，建議台灣大學社會服務團(團長王復蘇)農村組(召集人蔡吉源)，針對農村經濟九大問題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取得農家對當前問題確實反應後，紮實地向行政院所做的報告。該調查研究報告(蔡吉源主稿)完成於1972年3月15日。惜因極右派(如王昇)杯葛，並未公開發表，只由台大刊印50本，限相關主管機關(如農復會，即後來的農委會，及省農林廳)之相關人員閱讀，成為當年「加速農村建設運動」政策之張本，解除農家層層重稅、及非稅盤剝之苦，為第一次石油危機(1972-73)工業勞動力眾多失業人口回流農村，解決其生活困頓問題奠定基礎。

1972年5月20日，蔣經國先生成為中華民國流亡政府行政院院長，他延攬李登輝教授入閣，成為政務委員。在此前後師生互動相當頻繁，有兩件事值得一提：

其一，1970年4月24日，紐約刺蔣案發生後，因為李登輝教授在Cornell大學時，曾與刺蔣案涉案人黃文雄熟識，因而時常被警備總部相關人員約談問詢，至為困擾。彼時，他在農復會農經組任職已將近10年之久，迄未升遷，內心已夠鬱悶，又遭此無妄之災，頗有大志難伸之嘆。曾對我們(梁國樹老師、林健次和蔡吉源)說：「只要給我擔任省農會總幹事一職，我一定能把台灣農業帶到像日本農業一樣發達進步！」足見李教授當年對農家困苦的情形，農村經濟落後狀況，不但瞭如指掌，而且深具「登農民於衽席之上」的非常濃厚之使命感。作為貧苦農家子弟的我，受到感染，總是油然而生敬佩，自然而然很願意追隨李老師，要以李老師的志業為重。不但前往台灣各地深入調查農村悲慘情形，而且樂於跟他撰寫農業經濟論文，將重稅盤剝農民情形作深入的研究，以為改革農村經濟之張本。

其二，當蔣經國一手掌控的情治系統，針對李登輝完成密集約談與調

查告一段落後，李教授繼王友釗先生於 1970 年末升任農經組組長，再經一年多歷練，而於 1972 年 5 月 20 日，被蔣內閣延攬為政務委員（並兼任農復會顧問），以執行前述「加速農村建設運動」九大措施及政策。坊間對農經專家李登輝教授擔任政務委員的解讀，是要解決農村經濟凋敝問題，功成就會身退；農經學界且有許多人以黑馬視之。做為一個用心觀察的學生，我已敏感預測將來繼蔣經國之後非他莫屬，而超越省農會總幹事、解決農業問題者及黑馬論。

同年 6 月 20 日左右，當李老師邀我到農復會顧問辦公室時，就斗膽向老師進言：「下一個職務不是擔任部長而是爭取省主席，然後可以援嚴家淦先生之前例出任副總統，再在蔣先生健康惡化後，繼任總統一職。」在大膽預言之後，我勸他及早脫掉教授的道袍，自我訓練成為一個政治家，帶領台灣人民向前邁進。李老師的反應是，為什麼省主席一職那麼重要？（蔡吉源，2010：97-100）。這一問，表示當時的李政務委員，還是全心全意在關心台灣農民生計與農村經濟問題的解決之上。但以我研讀法政諸書的瞭解：台灣農村經濟凋敝，是植根於殖民與剝削體制的政治問題，農民生活桎梏，是源於長期受到歧視與重稅盤剝，若僅止於「加速農村建設運動」之農業改革九大措施，而缺乏政治改革，是無濟於事的。

從以上兩件事，足以證明李登輝教授的農業經濟學術研究與一生志業，是非常緊密結合的。在當時獨裁體制下，任何台灣本土知識份子長年受到壓抑，對於政治大多相對陌生；敢於著書立說批評政府政策者鳳毛麟角，而李登輝教授長年大膽批評李連春之糧農政策，已顯突兀；如今好不容易有一個為台灣困苦農民做一點事的機會，足以告慰平生之志，自然會全力以赴，而不做他想了。

叁、李登輝總統的施政重點與得失

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期間的施政重點，可以從《經營大台灣》（李登輝，1995）一書觀其梗概。恰如該書開宗明義，以「經營大台灣是一項時

代的志業，更是一項歷史的實踐」一樣。尤其第十六章，在〈經營大台灣的藍圖〉（李登輝，1995：175-88）裡表現無疑：

以國人認同台灣、根留台灣為目的，也以國人認同台灣、根留台灣為條件，大台灣未來的藍圖，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文化和國際地位各方面，都蘊含著精實的內涵與蓬勃的生機。

由這一段引言，可以認識到實現「全民自由意志」之政治民主化改革（即總統民選），進而使「中華民國」成為民主而有效率的政府，俾能推動「台灣」在各方面進步；在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及全球化下促進產業發達、科技進步、經濟成長與分配公平；在公平正義原則下，營造一個族群和諧的社會，令人人得享家園之樂。而「經營大台灣」與「建設新中原」是並列向前行的概念，已經強烈隱含要求中國流亡政治難民，放棄大中國及統一的夢想，轉向「認同台灣，根留台灣，發展台灣」的思考模式。

這是繼李總統在 1990 年組成「國家統一委員會」，1991 年頒布『國家統一綱領』，並於 1994 年年底，提出這個前瞻性主張，反復向「外省人」強調建立「生命共同體」、「族群融合」、「社區意識」等新觀念，期能讓全體台灣人民擴大視野，以更大格局、更高境界，將全體台灣人民融入社區共同生活圈中，一同建立一個現代化文明社會，進一步確立台灣作為中華文化「新中原」的優勢地位。

歷史學家孫慶餘先生（1995：301-309）指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確實是李總統最前瞻、最具啟發性的思想。站在這個理想的藍圖上，李總統在對教育界演講（1995 年 2 月 10 日）中，要求培育國民民主素養，體認社會責任與個人自由真諦；提高科學教育水準，培養對生活與工作（倫理）的正確態度；陶冶國民文化修養，建立社區生活共同意識。此外，在理想的實踐方面，在推動民主改革及國家建設方面，遵循五項基本原則：理性、協商、平衡、漸進與堅定原則。

李前總統將歷史觀與哲學觀結合，以認知政治處理方式來再造台灣，推動自由民主。他曾指明，政治工作者如果沒有任何信仰與哲學觀，就不會有使命感的認知，領導者的成敗決定於其「素質」與「能力」的高低。

做為李登輝總統最早期入門弟子之一的我，在那些日子裡，總是聚精會神地關注李總統所提出的施政理念及其後續發展。毫無疑問，在當年由於李登輝情結，即使錯把世界文化的雜草中華文化（希特勒語）拿到台灣推而廣之，李總統的施政，仍然獲得本土台灣人高度肯定。李總統豐富的學識，堅定的意志及毅力，穩健的改革步伐，以及符合民主潮流的正確思想，應是做為政治領導人成功的因素²。

一、李登輝總統施政的得

作者認為李總統施政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最大的貢獻在於努力要把台灣從極端落伍的蔣家獨裁體制裡解放出來，重新拉回到歐、美、日先進民主政治軌道上。此時此刻我們在談寧靜革命的成就，可以像吃飯睡覺一樣簡單。但是，李總統在寧靜革命期間的生活，可不是像「桌上拿柑」那樣簡單。從 1988 年初，接下獨裁者蔣經國的棒子那一刻起，權力鬥爭就如影隨形。深具智慧的李總統，再三以「主權在民」、「從民所欲」、「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建立生命共同體」、「重視全民自由意志」、「族群融合」及「認同台灣」等詞彙，來和台灣人民相期許。終於能突破不同既得利益者、外省權貴相互間權力鬥爭之空隙，實現民主化改革最重要目標——「總統民選」，完成民主改革的形式。

回顧 1988-1995 年間民主改革過程，可以用「驚濤駭浪」四個字來形容。而做為國政方針掌舵者，在黨、政、軍、特及媒體勢力，均未曾充分

² 可惜，李總統言者諄諄，外省人聽者渺渺。當 2000 年 3 月 18 日民進黨的陳水扁先生贏得總統大選之後，尚未卸任的李總統立即成為外省權貴之箭靶！也有思想極右的本省菁英附和外省權貴強烈反李，李總統力挺之連戰先生，甚至力促李主席交棒下台。證明建設中華文化新中原並未成功，其失敗理由在於李總統並未進行制度和組織的變革，以框制人性自私弱點，竟先從心靈改革做起。沒想到心靈改革，是使善人更加善良而繼續容忍惡人剝削；反而對惡人之惡行毫無嚇阻作用，其惡行更因善人忍讓而變本加厲。爾後發展，也證明要求殖民思想高度濃厚的外省權貴認同台灣，也是完全落空。以李總統一手培植新台灣人馬英九先生為例，本身擁有美國綠卡，女兒都滯美不歸，心懷終極統一，抗拒認同台灣。這種典型的流亡心態——沒有移民認同本土、在本土生根的心態——怎能以新台灣人稱之，來騙取本土台灣人感情與選票？

掌握情況下，要改變獨裁體制走向民主體制，不但要具備歷史使命，更需要高度的道德勇氣。李總統之不同於其他台籍政客只想與流亡政府中諸多外省權貴既得利益者分一杯羹，而無視於中下階層人民的苦痛者，這正是他之所以聲望日隆迄今不墜的原因。

進而言之，台灣在日治期間已經成為高度政治文明、經濟發達與社會文化相當進步的地區。無奈，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流亡政權軍事佔領台灣以後，否定台灣先進的政治文化及守法精神，強以落後貪腐的中華政治文化，加諸台灣和諧的社會，歷經四十餘年，敗壞政風與社會和諧，使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流失殆盡，代之而起的是族群歧視與特權橫行，社會公義蕩然，民眾沒有知道的權利，也沒有思想的自由。幸而李總統接下爛攤子以後，積極任事，堅持走艱難而正確之民主改革路線，終於使全體台灣人民得以再度呼吸到些許自由、民主與法治的空氣！

除了政治民主化改革以外，李總統部分經濟改革成就也值得推崇。在前述農村經濟改革 (1972-78) 獲致極大成就，有助於台灣順利的渡過兩次 (1973-74 及 1981-82) 石油危機失業潮及經濟衰退以外，在其主政期間，依其主管國防外交及兩岸關係的權限，於 1996 年提出限制對中國投資金額之「戒急用忍」政策，應該是台灣經濟在 1990 年代後期發展與穩定的根源。

1996 年 9 月，李總統為避免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以免政府面臨「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窘境，提出對中國經貿交流最高指導原則——戒急用忍政策。斯時統派媒體無不群起而攻，但在回顧近十五年來台灣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發展及亂象，我們不得不佩服李總統的遠見。尤其相對於 2001 年後，陳水扁政權 (2000-2008) 「積極開放」無效管理，與馬英九 (2008-) 「全面開放」終極統一，使台灣經濟陷入大中國泥沼與黑洞，以致因失業而自殺的人口大幅激增；李總統的遠見，絕非年輕一輩之扁、馬所可望其項背。

至於國內經濟改革方面，由於李總統並未直接接手處理財經業務，除了 1996 年總統大選期間提出「兩稅合一」，減輕工商企業所得稅捐負擔，俾根留台灣並吸引外資以外，幾乎從未有任何干預行政院財經施政措施

者，以致台灣經濟在轉型期間，未能進一步加速改革財稅體制（如事涉社會公義的土地稅制改革及所得稅制改革），而有今日嚴重的貧富差距。

二、李登輝總統施政的失

孫慶餘先生在《李登輝風暴》（1995）一書的序言中提到，「李總統在遭到正統國民黨員的鬥爭時，總是顧慮太多且流於息事寧人；由於顧慮太多，決策猶豫不定；由於息事寧人心存仁厚，反而被對手軟土深掘，從零星挑戰擴大為集團對抗，也被對手視為軟弱及無用（能？），使小風暴逐漸匯合成大風暴。」孫慶餘的文字可以說是十分含蓄且不忍苛責。就記憶所及，李總統在渡過與蔣家權貴及極右派的蜜月期（1988-89）後，幾乎連年都在受外省權貴激烈挑戰鬥爭中過日子。

從 1990 年總統選舉風波及三月學運起，揭開了一系列鬥爭的序幕。1992 年蔣孝武先生死後，主流派及李總統陷入孤軍奮戰局面，在國民黨十三屆三中全會及國大臨時會時，以未能善用支持改革民意，而一事無成；1993 年幸賴民進黨支持與合作，迫使郝內閣總辭，由連戰先生擔任閣揆，終止拖垮財政的六年國建案；1994 年因說了「台灣人的悲哀」而遭受圍剿案及 1995 年閏 8 月中共犯台謠言干擾案；1995 年黨產爭議白熱化，非主流倒李勸退之聲不斷等；1996 年行政院長任命之爭，雖是一個小插曲，但已形成主流派內部矛盾，而有 1997 年反凍省修憲聯盟案；以及 1999 年 7 月兩國論案等³。

³ 我的解讀是：蔣經國先生死後，蔣孝武先生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最有權力的人。他一手掌握情治特務系統，也就掌握了黨、政、軍、警諸要津。而李登輝總統、李元簇副總統、郝柏村總長、蔣彥士秘書長、王昇先生、李煥先生、宋楚瑜先生等都只是蔣家家臣。由蔣孝武先生自新加坡回台北（1990），郝柏村總長必須到機場相迎，且蔣緯國先生竟因蔣孝武先生一句「不屑於花一分鐘跟他（蔣緯國）見面談」就喪失往日的雄風等跡象可見一斑！1992 年 5 月，蔣孝武先生猝死後，國民黨內部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李總統並沒有足夠的權力號令情治特務，反而受到情治特務的監聽，不論是主流派或是非主流派，都在為主導國民黨政權而鬭爭。李總統就是在兩派鬭爭的狹縫中，盡力為臺灣人民做一些改革工作，直到蔣彥士先生逝世（1998）後，他才真正享有一點權力，得以回過頭來思考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問題，而有兩國論的宣示。但是為時已晚，不到一年李登輝先生就雙雙卸下總統及國民黨主席職務，兩國論後續諸多主張並沒有在任內完成。

直到 1998 年蔣彥士先生病逝前，李總統對外承受非主流派無情鬥爭，對內承受李元簇先生、蔣彥士先生及宋楚瑜先生掣肘，令其不能善用台灣當時的天時、地利及全體本土台灣人民的人和，大刀闊斧改革，如大幅度組織改革及大規模人事異動；反而疲於應付諸多雜碎的人與事，是他未竟全功的主要原因。這恰如日本幕府將軍德川吉宗，武功固然高強，心念也趨向革新，但是，並未體察國際新情勢，順應外在形勢變化來主導國內大政改革方針，以至於只能停留在「重農賤商」觀念中，重整財政擴大再生產，而無法終止鎖國政策，與西洋先進文化結合，進一步進行現代化國家建設。

換句話說，李總統主政期間，正是國際經濟全球化與自由化甚囂塵上時期，竟仍大量起用蔣家老舊官僚掌握法政財經要津，因而走進中國化死胡同，掏空了台灣，及至醒覺祭出「戒急用忍」時，已經大勢已去；致使臺灣經濟在其執政後期，已有走下坡趨勢。此外，諸多措施有待檢討，諸如：於 1990 年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混淆本土台灣人台灣意識；稱外省權貴為「新台灣人」，得以繼續在中華民國體制上牽制台灣政治經濟決策等，都是台灣價值近 20 年來日趨崩退的主要原因。由此錯失可以推論，李總統受蔣經國先生影響極為深遠，李總統接下蔣氏棒子以後，無法跳脫中華民國體制來思考台灣大未來，既受制於非主流派外省權貴，也受制於主流派蔣氏家臣，而少有突破中華民國殖民剝削體制的大改革，致使司法改革一事無成；教育改革徒託空言；經濟優勢逐漸流失；財政困難日益嚴重；農村經濟日漸凋蔽。

肆、李登輝前總統壯志未酬老驥伏櫪（2000-11）

〈李登輝研究〉（謝聰敏，1993：113-42）一文指出：「李登輝於 1944 年 1 月，依日本政府規定入伍從軍⁴，而且朋友楊廷椅則避不從軍，彭明敏

⁴ 台灣日治時期（1895-1945），日本政府依法並未強制台灣青年當兵，但已有為數約 40 萬台灣青年志願從軍，赴中國及南洋打仗。迨至 1945 年初，天皇敕令台灣正式納入日

亦同，彭教授當年甚至鄙視日本流行歌曲。」戰爭結束，台灣 3 萬留日學生集體回歸「祖國」者略有 8,000 人之多，分屬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朱昭陽）、台灣同鄉會（廖玉樹）、光復會（陳文彬）、大眾聯盟（廖昭明）及混合台灣與中國留學生的「中華民國」留日青年同志會（林順昌），而李登輝並沒有參加集體回歸「祖國」計畫。又說「1945 年 8 月 15 日天皇宣布投降之日，台灣很多留日學生歡欣鼓舞，所以，已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思想，且在等待回歸「祖國」期間舉辦座談會，進修北京語，……。」同一時期，東京韓國留日學生，舉辦座談會是強烈主張韓國自日本獨立，而台灣留日學生則昧於國際法、國際形勢及漢文化思想，僅只要求台灣自治而未有強烈的獨立主張，以至於為蔣介石流亡集團乘虛而入，將本土台灣精英趕盡殺絕，使 228 事件後，殘存之留日回歸「祖國」的青年學生在爾後的白色恐怖治理下，身心俱創後悔莫及，而有爾後的台灣獨立運動。

由於李登輝教授在當年是極少數（37 人）強制志願從軍者，與大多數學生鄙視日本，醉心研讀孫文《三民主義》或蔣介石《中國之命運》者完全不同。我們可以揣測，李登輝先生在 1970 年代初加入國民黨之前，是充滿台灣本土意識邊緣化之失落感者。這就十分值得所有本土台灣人民由衷地敬愛他、支持他、擁護他。

然而，正當我們堅決敬愛、支持、擁護李登輝總統的同時，大家都不自覺地落入獨裁者蔣經國的圈套——跟著李總統支持中華民國體制，包括支持 1986 年 9 月蔣經國插手主導成立之民主進步黨（白瑄，1999）；容忍外省權貴需索，及落後中華文化教育對下一代洗腦；淡化台灣意識，欺騙台灣人民，承認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民主進步黨黨章第一條）；要本土台灣人民放棄台灣獨立建國主張（洪奇昌，2011），接受終極統一的馬英九統一主張，而陷台灣於中共武力併吞的險境。

我們的困惱是：李登輝總統卸任以來，台灣失落了十年之久！為什麼失落？如何補救？退休後李前總統又扮演了什麼角色？成效如何？這些問題錯綜複雜，應該由政治學者或歷史學家來做深入的研究。在此僅作粗略

分析及敘述：

1. 本土台灣人對這十年的失落感，完全從獨立建國運動不進反退現象發端。由於李登輝總統不是革命家，而是民主改革者；在他主政時期，國民黨內不論是非主流派，或是主流派要角，都是由外省權貴扮演，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薰陶下，雙方都是鬭爭高手，且分別扮演白臉與黑臉，輪流對李總統需索政治權位與經濟利益。李登輝總統極需奧援，以展現實力走自己的路，為下一個執掌政權者，開闢一條台灣獨立建國康莊大道。奈何，民主進步黨早已由棋高多着的蔣經國插手主導，混入許多蔣經國安排的人馬，內部意見分歧，以致李總統在改革過程中，並未獲得強而有力的奧援。除了總統民選以外，對落實獨立建國主張方面著墨有限。反而，代表本土台灣人意志的民主進步黨於 1989 年走進議會路線，十分積極地參加中華民國體制不民主且不公平選舉活動，擔任中華民國政府首長或民意代表，且有一些人在當選之後，與外省權貴一樣貪腐成風，不但淡化獨立建國鬭爭意義，反而造成國際人士認為本土台灣人已完全接受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殖民體制的印象！從民主進步黨建黨以後的各項選舉，即可看出本土台灣人的歇斯底里，都以為只要民主進步黨黨員當選總統，台灣就可以獨立建國了。哪知道陳水扁總統執政八年，不但獨立建國成了泡影，而且陳水扁總統卸任後不久，就變成中華民國階下囚！隨著本土政權淪喪，台灣主體意識逐漸褪色，尤其在馬英九終極統一目標下，對外積極向中國釋放善意，對內盡其所能掩飾其終極統一企圖與挾共制台陰謀，致台灣社會杌隉不安、人心惶惶。
2. 聲稱自己是改革者的陳水扁總統在執政期間（2000-2008），對外省權貴及中國政治文化了解有限，又在李登輝總統主政期間與眾多本土台灣人一樣，不自覺地支持了中華民國體制，因而並未有突破前人的獨立建國作為，反而被「四不一沒有」綁住手腳。2000 年秋，為核四案朝野爆發激烈鬥爭，掌握媒體的國民黨佔盡上風，民主進

步黨大受民眾排斥，本土政權搖搖欲墜。李登輝前總統擔憂台灣前途，遂自 2001 年 4 月起，支持台灣團結聯盟（以下簡稱台聯黨）建黨，以收攬中間選民，力挺本土政權。李前總統也積極參與台灣正名與制憲運動，期能雙管齊下，力促「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早日實現。然而，當我們熱心支持台聯黨站穩腳跟的同時，也有民進黨人深怕台聯黨壯大而給予無情打擊；而台聯黨本身又極不爭氣，由極少數人壟斷有限資源，排斥人才參與，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情況下，台聯黨運作不到十年，已經奄奄一息，毫無戰鬥力可言，讓李登輝前總統的政治光環完全失色而無可奈何！

至於正名制憲，雖然不斷透過李登輝學校訓練種子學員散佈各地去宣傳鼓吹，也透過群策會找許多學者專家來診斷治療，惜均與台聯黨並未緊密配合，各自為政的結果就是三敗俱傷。十年於茲，正名制憲也僅止於紙上談兵，而台聯黨則面臨泡沫化危機。

由此可見，卸任後李前總統之影響力大約侷限在精神層次，而無法對實質層次起重大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於李總統身邊政治人才奇缺，尤其缺乏優秀政治領導人才，這當然與李總統的政治風格有關。李總統的道德文章和行政領導都是一流，但是，由於在任期間沒有突破蔣家政權流亡政府體制的羈絆，未能破格起用深具本土台灣意識之人才，僅就蔣家家臣或御用學者中覓才，講究出身背景及資歷輩分；因此，眾多台籍政治人物或只能等因奉此，無能大開大闢進行突破舊框框的限制，等到樹倒猢猻散，無一具有力挽狂瀾的能力；或有些人在中華民國貪腐體制內相習成風，一旦掌握到一點權力便自我膨脹，忘掉本土台灣人長期苦難，但知享受納稅人供養，不知要為台灣盡心盡力；等到李前總統察覺失敗原因，再來調整腳步，時間與機會均已流失矣！

所以，李前總統即使為台灣前途宵衣旰食、苦心籌劃，用心經營；但在大政方針多為蔣家家臣及外省權貴主導情形下，即使卸任後仍是一方意見領袖，但由於缺乏精幹實幹的幹才，來整合旗下各單位的人力與資源，在民進黨大派系和國民黨分進合擊的滲透、分化與挾擊下，李系人馬紛紛

潰敗，而喪失中流砥柱作用。中道力量既已沉淪，政治經濟社會怎不亂象百出？李總統二十年來的努力，大大超過應有的收穫，值得長年追隨李前總統之後生晚輩，自我警惕檢討改進⁵。

伍、結語

童門冬二（2009）認為，成功的政治領導者，必須具有開闊而正確的國際觀（國際化思維），再根據正確國際觀，來擬定國內施政大政方針（在地化行動）；錯誤國際觀或錯誤大政方針，終將造成國家災難，而令民眾失望。台灣當前的危機，就是兩者同時存在。

首先，是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以積極中國化來取代應該優先與歐美日加強交流的國際化，將台灣鎖進中國大黑洞，為終極統一預做準備。簽訂 ECFA 即其具體中國化政策，不但引進中資、中勞、中客，而且擴大台資流向中國，繼續掏空台灣。

其次，是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早已放棄台獨黨綱，走進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死胡同，要將台灣送給徒有流亡官員及政治難民，沒有土地，也沒有台灣主權的中華民國，藉以與中國北京政權建立臍帶關係，陷台灣人民於中共軍隊入侵統一台灣的險境！

李登輝前總統對於以上兩者應該已充分了解，且對當前台灣危機一定也了然於胸。因此，內心一定非常著急。2008 年春夏之間，其兩度應邀親臨國家發展論壇演講，鼓勵與會人士，努力以赴力挽狂瀾，可以知之。

⁵ 2004-2006 年間，李前總統對台聯黨的表現十分失望，作者以「新野雖小卻是劉備建立蜀漢的根基」為由，勸其再觀後效，不可棄之不顧。2008-2009 年間，李前總統應國家發展論壇之邀，有助其籌組第三勢力參加 2009 年底地方選舉之意，奈何決策者游移不定，阻力重重而作罷。經濟理論中雙占（duopoly）市場，往往聯合起來嚇阻（deter）第三個廠商進入市場，以分享極大市場利潤。因此，新潮流系掌控的民進黨與國民黨自然以形成雙占，共同抵制第三勢力介入政治市場，才能由雙方繼續輪流執政、輪流分享臺灣龐大政治經濟利益。新潮流為主的中華民國民進黨與中國國民黨勾結（collusion）結果，在 2009 年底演出一場「民主進步」好戲碼，第三勢力乃胎死腹中，國家發展論壇遂轉進為李登輝民主協會，繼續為本土化改革而努力。

然而，2008 年本土政權淪喪前後，整個國內政壇氣氛與鬭爭形勢極不利於李前總統的主張。回顧 2006 年紅衫軍倒扁期間（9 月至 11 月），李前總統以為透過立法院投票，才可以順利倒扁，但在台聯立法委員紛紛倒戈之後（2007 年初），李登輝情結隨即潰散，以至於未能統合綠營，以營造 2008 本土政權保衛戰勝選的契機，終於讓馬英九先生的謊言騙走本土台灣人民的選票，造成台灣今日的危機。

政治局勢瞬息萬變，決策者必須掌握重點及正確步驟，在重要關頭切不可猶豫不決，喪失良機，以致全盤皆輸。李前總統若能在當時大格局思考，協助施明德奮力一擊倒扁，再以保衛本土政權為宗旨，號召本土台灣人民的支持與團結，先贏得 2008 大選，再逐步實現制憲正名目標，今日情況應有所不同。然因猶豫不決而給予反李勢力極大操作空間，在台聯立法委員倒戈，立法院三罷失敗後，李登輝情結已經明顯潰散矣！

總之，李登輝總統只是一個民主化改革者而不是革命家。改革者往往顧慮許多相關變數，因而在面對決策困境時流於猶豫不決，喪失行動契機。證諸早年執政時期與非主流派鬭爭，晚年退休後本土政權保衛戰，多有這些跡象。這也是蔣經國先生極為高明之處，培養老實憨厚的本土學者李登輝教授為接班人，讓他保護蔣家流亡政權命脈，更讓本土台灣人民誤以為台灣人出頭天，而降低獨立建國熱情；另一方面則插手主導中華民國民進黨成立，混淆本土台灣人政治判斷，其中某些人的作為且和外省權貴互唱雙簧，共同為終極統一和而求同而努力。因此，我們多次看到台灣人的悲哀和李登輝總統的悲哀是一致的。在蔣經國先生死後 24 年間（1988-2011），本土台灣人和李登輝總統，都雙雙陷入蔣經國的世紀大騙局和大佈局中，尚未完全跳脫出來！

幸而，在以上這些錯誤連年情況下，美國和日本看清東亞局勢與台灣安危唇齒相依關係，且於近（2010）年密集舉行美韓（2010 年 11 月）與美日（2010 年 12 月）軍事演習，遍及日本海、黃海、東海及菲律賓海，佈置重兵及先進軍備以應付東亞變局保衛台灣安全。在台灣方面，除了美軍太平洋艦隊曾進駐左營外，美國空軍也進駐台中清泉崗基地，顯示美國軍方

絕對不會置台灣安危於不顧。因此，本土台灣人民仍有很大空間繼續為建立台灣國及獨立自主而團結合作，共同奮鬥！凡我台灣同胞請勿懷憂喪志！更寄望李登輝總統保重身體、健全體力，繼續領導本土台灣菁英，實現獨立建國的遠大目標！

參考文獻

- 白瑄，1999。《全民公敵調查局》。台北：台灣之聲電台。
- 李登輝，1983。《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台中：大功印刷廠。
- 李登輝，1995。《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出版社。
- 洪奇昌，2011。〈兩岸經貿是 2012 重要議題〉《中國評論新聞》3 月 12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6/2/0/9/101620904.html?coluid=93&kindid=3311&docid=101620904>) (2011/8/27)。
- 孫慶餘，1995。《李登輝風暴》。台北：稻田出版社。
- 童門冬二（詹慕如譯），2009。《將領之才，參謀之才——跟日本將相學領導與謀畫》。
台北：究竟出版社。
- 蔡吉源，2010。《走過台灣五十年》（二版）。台北：銘瑋文化。
- 謝聰敏，1993。《黑道治天下及其他》。台北：謝聰敏國會辦公室。
- Lee, Teng-hui. 1968. *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 Ph.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Lee, Teng-hui. 1983.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2 Vols. Taichung: Ta-kung Printing Co.
- Yotopoulos, Pan A, and Jeffrey B. Nugent. 1976.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The High Aspiration of Professor Teng-Hui Lee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aiwan

Chi-Yuan Tsai

Secretary-General, Taiwan Heart Association, Taipei, TAIWAN

Jiun-Mei Tien

Research Fellow,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high aspiration of Professor Teng-Hui Lee and his contributions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 before he became the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to the ROC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in May 1972; and when he became the President in early 1988, President Lee began to lead Taiwan to the road of Silent Revolution — democratization without bleeding. Thereafter, we describe how Professor Lee played his role to keep Taiwan going on the track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since 2000 while he was relieved of his presidency.

After piling up voluminous research papers in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fessor Teng-Hui Lee became an internationally well-known scholar. In 1972, he was recruited by dictator Ching-Kuo Chiang,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ROC in exile. In 1984, Professor Lee became the Vice President to President Chiang and succeeded Chiang's Presidency while Chiang deceased in January 1988. President Lee aggressively asked for democratic reforms and published a book on "Managing the Great Taiwan" as the blueprint of the silent revolution plan in 1994. With strongly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of Taiwan we supposed he would make it good to liberate native Taiwanese from shackles and to spread social justice everywhere in Taiwan. Nevertheless, serious power struggles continuously came forth. Chinese refugee people on Taiwan opposed Lee's policies. As a result, democratic reform was incomplete. In the meantime, capital outflows to China were also uncontrollable even if Lee administration executed "No Haste Be Patient" trade policy aimed at Taiwan-China informal

international trade in 1996. Therefore, President Lee was vulnerable after he was relieved of his presidency. As a national leader, President Lee was too conservative to make a decisive change in his Administration. He failed to employ the distinguished marginal power elites in Taiwan to substitute for the refugee fellows who were inclined to protect the private interests of Chinese people on Taiwa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China. In other words, President Lee was confused by the mirage of the ROC in exile and ignored the undetermined Taiwan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o as to have many bindings by the ROC conventional restrictions. Of course, we do not have any reason to blame him because President Lee is an evolutionist rather than a revolutionist.

Keywords: Lee Teng-Hui complex, Managing the Great Taiwan, No Haste Be Patient Policy,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aiwan Solidarity Union